

## 福音普传

\*\*\*\*\*

### 福音的内容和宣教



叶大铭牧师

(北约恩典福音堂主任牧师 (Toronto, Canada), 前日本宣教士)

基督教宣教是根基于主耶稣的福音。没有福音便没有救恩，没有教会，也没有宣教。然而近年来在神学上和宣教学上产生了对福音之意思和内容的不同理论，以致影响宣教的实践。本文尝试分析三种意见，和作简单的响应。

福音的内容是以耶稣为中心(罗一 1-5)。然而当宣教士向不同文化的种族传福音时，便要处理以下的问题：耶稣是谁？要认识和相信耶稣到什么地步才可以进入救恩？除了讲论耶稣外福音还包括什么？骤看起来这些问题好像很简单，受过神学训练的宣教士应能从容解答，但是却带来宣教学上不少争议。

#### 一. 多种的福音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圣经神学的问题，是有关福音的多元化内容。新约圣经学者邓恩(James Dunn)指出新约圣经内有不同的福音，有耶稣所传天国的福音，使徒行传的福音，保罗的福音，约翰的福音。这多元化的福音内容显示不同的福音内容，甚至不协同的福音内容(注 1)。其它学者虽然不赞同多元化的福音内容是不协同的，但也提倡福音是多元化，因此有多种的福音(注 2)。

无可置疑新约圣经记载着不同的福音内容。这些差异是因为在不同处境中要有效的传福音才产生出来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差异并不是重大的差异，而所记载不同的福音内容中我们可以找到共通之处，即是福音的中心。在新约圣经中保罗在罗马书中最清晰阐明福音的意义，这福音中心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和从他而来的救恩(罗一 1-5, 16-17)。在四福音书中只有马可福音以自称福音为开始(可一 1)。古力(Robert Guelich)指出在这节中「福音」并不是一种文体，而是表示特别的内容。这福音的内容首先是有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其次是应验旧约先知的拯救来临(注 3)。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信息也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和从他而来的救恩(注 4)。蓝思欧(Eugene Lemcio)从大部分的新约书卷中找出六点共通之处：神、耶稣、耶稣的被差遣和复活、向神的回应、信心悔改、带来的福(饶恕、永生等)(注 5)。史彼得(Peter Stuhlmacher)的新

约神学研究也作出同样的结论(注 6)。甚至邓恩也列出福音的共通点，包括耶稣的复活和被尊崇、信心和委身的需要、和救恩的应许(注

7)。因此我们可以总括新约圣经所记载的福音内容是有一个共通中心，内容包括有关耶稣基督和从他而来的救恩。

其次是有关基督论。邓恩在研究最早期教会的基督论中，提出五旬节后使徒所传的基督和以后所传的基督有所不同。最早期所传的基督是属于「低基督论」，即指基督是弥赛亚、人子、最后的亚当等，并没有基督在创世前已存在和基督是神的概念。后者的概念是属于「高基督论」，要等到后期的新约书卷如约翰福音才有这样的基督论(注 8)。既然传低基督论和传高基督论也是传福音，福音可算是多种的(注 9)。

虽然邓恩的论说引起新约神学界中很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只局限于神学界中。可是在这十多年来内，穆宣(向伊斯兰教徒宣教)的局势有转变，产生了一个新现象。这个新现象一方面是个喜讯，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大的困惑。

这个新现象就是有不少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徒)相信耶稣基督，但仍然保持穆斯林的身份。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穆宣的宣教学者提出以下教会的区别。

C1:从文化和言语上都被穆斯林视为陌生和外来的教会

C2:用当地言语，但仍被穆斯林视为陌生和外来的教会

C3:将伊斯兰宗教和文化分开，采取适合文化但没有宗教意思的习俗礼仪

C4:和 C3 相似，但也接纳没有违背圣经的伊斯兰宗教仪式，信徒不自称基督徒，而自称为伊撒(Isa、耶稣的亚拉伯文称呼)的跟从者。

C5:和 C4 相似，但保持穆斯林的身份，社会也认为信徒是穆斯林(注 10)。

C4 教会出现于七十至八十年代，而在九十年代则出现了 C5 现象。这现象也是所谓「羣体之内的运动」(insider movement)的一个好例子(注 11)。

C5 现象并不是宣教士刻意造成，而是在穆斯林羣体中自动出现的。为了维护和协助这现象，有些宣教学者尝试从圣经立场来确立这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基督论。穆斯林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反对之一就是称基督为神的儿子、为神。若最早期教会的基督论是低基督论，只要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也可以得救。因此穆斯林接受耶稣基督后，仍可以保持穆斯林的身份。这样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敌对和逼迫，又可以留在羣体中作有效的见证(注 12)。

这论点是颇为复杂，笔者只可以作简单的响应。

1. 有关新约圣经的基督论之演变，学者提出三个可能性。

- a. 从简单变为复杂，低基督论变为高基督论。但无论低或高，都是没有矛盾的。
- b. 从简单进化为复杂，低基督论进化为高基督论。两者是有矛盾的(注 13)。
- c. 从最早期教会开始，低基督论和高基督论已同时存在。两者可能有矛盾，任由信徒选择(注 14)。

维护 C5 的宣教学者采取 b.或 c.的立场(注 15)。但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比以上三个可能性更符合新约圣经。

- d. 从最早期教会开始低基督论和高基督论已同时存在，但两者没有矛盾(注16)。低基督论和高基督论都是对耶稣基督的不同认识，两者并存就能加增信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2. 维护 C5 的宣教学者采取邓恩的论说，但邓恩本人却尽力减少矛盾，甚至可以说回避矛盾(注 17)。

3. 究竟认识基督到怎样程度，藉相信而得救呢？这是神学上一个大问题，在实际宣教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注 18)。田能(Timothy Tennent)指出救恩不单是因信称义，也包括现在生命的成圣和将来的荣耀。若对基督只有浅薄的认识，这样的救恩是不足够的(注 19)。

4. C5 的现象是神的特殊工作，但 C5 「穆斯林信徒」要面对很大的挑战。田能认为 C5 的现象应是过渡性，需要演变成 C4 教会(注 20)。是否如此，我们要等待将来的发展。

总括来说，基督论包括低基督论和高基督论。因为只有一个不含矛盾的基督论，所以只有一种福音而不是多种福音。当然面临不同处境，宣教士可以灵活的拣选适合文化的基督论来开始传福音。但长远来说仍需要传讲整全的基督论。

## 二. 没有固定的福音信息

圣经虽是神的话语，但也是人的作品，是特定文化处境所产生的作品。在不同的文化处境中需要改变福音的信息吗？如果需要改变，岂不是没有固定的福音信息吗？这些问题是对福音的第二个挑战。

人类学者卢雅各布(Jacob Loewen)认为福音的内容不是狭窄，而应包涵整部圣经的内容。因为在不同文化处境中需要传合适的信息，所以可以改变福音的信息。他列出四个原因。

1. 圣经的信息是多元化的。旧约和新约圣经的世界观是迥然不同的，甚至在旧约中可以找到不同的世界观。不同文化的民族会被不同的世界观吸引。

2. 在信心历程的不同阶段中不同经文会有特别的意义。

3. 在最初接受福音时不同文化会被不同的福音信息吸引。有些人喜爱神是爱的信息，有些人则喜爱宽恕的信息。

4. 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同一信息会带来不同的理解(注 21)。

这四个原因只不过提出在传递福音时迎合接收者的世界观和需要之重要，并没有证实福音没有固定内容或福音的内容包涵整部圣经的内容。对某些民族先从神是爱开始，然后引入福音。对另外民族传福音的救恩时则要特别着重罪恶的饶恕。这些不同的传递方法并没有影响福音的内容。

另外一个挑战是从人类学者卡查理(Charles Kraft)而来。人类学中有「形式」(form)和「意思」(meaning)的分别。在不同文化处境中同一形式会有不同的意思，能够传递同一的意思才是有效的传递。我们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形式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例如在圣经翻译中施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可一 4)，这「悔改的洗礼」的意思是「从罪恶回转，接受洗礼」，因此后者的翻译是更有效(注 22)。福音书中的地理名称是二千年前的名字，改作现代地理名称会更有效(注 23)。从这有效的传递原则来看，福音含有很多形式是需要改变才能有效的传递福音的意思。譬如福音书的耶稣是个二千年前的历史人物，我们是否需要改变这些历史背景呢？

人类学者希保罗(Paul Hiebert)指出「形式」和「意思」有不同的关系，从没有重要连带关系至不可分离的关系。西人的名字就是没有重要连带关系的例子，因此改变名字也没有重要影响。但历史事实则不同，改变形式(历史的记述)就改变意思了(注 24)。所以将耶稣现代化只会带来历史的歪曲，这是不能接受的。

总的来说，福音是有固定的信息。这信息是清晰的，不是整部圣经的内容。这福音的信息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和从他而来的救恩。当然在不同文化处境中，需要将福音处境化，使人容易明白接受。这方法包括针对需要，适切的前提引导至福音，除去难明或难接受的概念和字句。有些名词如「神的儿子」可以用其它形式来表达同样意思，这样在穆宣中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 三. 福音和救赎

新约学者维利特(Tom Wright)在保罗的神学研究中提出保罗的福音基本上围绕着耶稣，即是说罗一 1-5 就是福音的中心。福音是有关耶稣而不是有关救赎。从这中心 他列举四点如下。

#### 1. 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

十字架代表神的胜利，使人从被虏的权势下得释放。这些权势包括罪恶死亡，但更重要的是「执政掌权的」(弗一 21)。

#### 2. 复活的耶稣

因复活耶稣被显明为弥赛亚、受膏的君王。

### 3. 君王耶稣

藉着君王耶稣的死神决定性的处理邪恶。

### 4. 耶稣是主

在罗马帝国下只有罗马帝王被称为主，但现在耶稣才是普天下的主。这代表政权的转移(注 25)。

从以上四点维利特提出福音不单是有关救赎，也是向所有掌权者一个挑战和宣告耶稣是主(注 26)。

维利特提出的福音特点就是福音不单是有关救赎，也有关向所有掌权者的挑战。这些掌权者可以是政治人物或制度，可以是社会制度文化。因为维利特的影响西方很多年青的福音派学者和人仕都对宣教改观，认为参与社会关怀和政治就是传福音。

从罗马书来看虽然福音在一 1-5 中只是围绕着耶稣，但跟着下去保罗立刻讲述救赎(一 16-7)，而且全书卷都是发挥这两节的内容。因此保罗的福音是有关耶稣，也有

关耶稣带来的救赎。宣告耶稣是主可以有社会和政治的含意，但这是间接的含意，只有救赎才是直接的含意。

当然教会的使命不单是福音宣教，也包括参与社会关怀和政治。但我们要清楚知道福音是什么和传福音是什么意思。若混淆不清基督教真理便失去根基了。

## 四. 结论

本文提出对福音之意思和内容的三种不同理论，并响应这三种理论带来的挑战。作为结论，福音有一个清晰的中心信息，就是围绕着耶稣和他带来的救赎。在不同文化处境中我们可以也应该将布道信息处境化，但福音的中心信息是不可以改变的。

注释：

[1]. James D. G. Dun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1977), 29-31.

[2]. James I. Packer, “The Gospel: Its content and communication” , in{Down to earth}(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103-104.

[3]. Robert A. Guelich, {Mark 1-8:26} (Dallas: Word 1989), xx-xxi.

[4]. James D. G. Dun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1977), 17.

[5]Eugene E. Lemcio, “The unifying kerygma of the New Testament” ,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33(1988), 6.

[6] 参 Frank J. Matera, “New Testament theology: History, method, and identity” ,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67(2005), 12.

[7]James D. G. Dun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1977), 30.

[8].James D. G. Dunn, {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London: SCM 1980),61-63.

[9].James D. G. Dunn, {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London: SCM 1980),266-267.在第二版的前言中邓恩表

示他的基督论是在转变中，参{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 A New Testam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 2<sup>nd</sup>ed. (London: SCM 1996).

[10]. John Travis, “The C1 to C6 spectrum” ,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34:4, 407-408.

[11].参{Mission Frontiers} 27:5全刊.

[12]. Joshua Massey, “Misunderstanding C5: His ways are not our orthodoxy”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40:3, 297. 详文是 “Misunderstanding C5 and the infinite translatability of Christ” 登于 {[http://bgc.gospelcom.net/emis/pdfs/Misunderstanding\\_C5.pdf](http://bgc.gospelcom.net/emis/pdfs/Misunderstanding_C5.pdf)}.

[13]. C. F. D. Moule, {The origin of chris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

[14]. John P. Meier, {Mentor, message, and miracles} (New York: Doubleday 1994), 919.

[15]. 虽然 Massey 尝试减少矛盾。参 Massey “Misunderstanding C5 and the infinite translatability of Christ” .

[16]. 不少圣经学者从解经上证实早期教会中已存在高基督论。参 Richard Bauckham, {God crucified: Monotheism and christology i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Larry W. Hurtado, {Lord Jesus Christ: Devotion to Jesus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和 Simon J. Gathercole {The pre-existent Son: Recovering the christologies of Matthew, Mark, and Luk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6.

[17]. James D. G. Dunn, {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 (London: SCM 1980), 62-63.

[18]. Brown, “What must one believe about Jesus for sal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7:4.

[19]. Timothy C. Tennent, “Followers of Jesus (Isa) in Islamic Mosq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23:3, 110-111.

[20]. Timothy C. Tennent, “Followers of Jesus (Isa) in Islamic Mosq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23:3, 113.

[21]. Jacob A. Loewen, “The Gospel: Its content and communication” , in {Down to ear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119-121.

[22]. Charles H. Kraft,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A study in dynamic biblical theologizing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Maryknoll: Orbis 1979), 265.

[23]. Charles H. Kraft,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A study in biblical theologizing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Maryknoll: Orbis 2005), 223.

[24]. Paul G. Hiebert, “Form and meaning in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Gospel” , in {The word among us} (Dallas: Word 1989), 101-120.

[25]. N. T. Wright, {What Saint Paul really sai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45-57.

[26]. N. T. Wright, {What Saint Paul really sai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61.

全文共约 4,000 字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八期，2007 年 4 月。**

(蒙作者允准刊载)